

需求侧与供给侧结合的消费升级路径研究

孙久文 李承璋

[摘要]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定义了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消费规模增加、消费内容优化和消费结构提升，并构建理论框架分析需求侧的收入提升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对于消费升级不同维度的影响。结合微观和宏观数据，本文发现：（1）居民收入提升可以带来消费规模增加，但并没有优化消费内容和提升消费结构，技术进步则可以增加消费规模和实现消费内容的优化，但对消费结构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2）无论从消费升级的哪个维度来看，居民收入提升和技术进步都会使得对方更有利于消费升级；（3）要实现消费升级，对于收入越低的群体而言，收入提升越有效，对于收入越高的群体而言，技术进步越有效；（4）对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而言，先提升居民收入、后侧重技术进步是较好的消费升级路径。基于此，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应当从供需两侧推进消费升级、围绕收入分层指导消费升级和明确区域消费升级路径。

[关键词] 消费升级；收入水平；技术进步

一、引言

基于对未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势必要求内需能作为战略基点撑起全局，消费升级作为开发内需、提振消费的必经之路，将直接决定战略转型的成功与否。我国消费领域的发展一直是积极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 2015 年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最终消费率也在 2019 年达到 55.4%，创下 2004 年以来的新高。^① 但不可否认，消费升级进程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制约。一方面，我国低收入群体仍广泛存在，约 6 亿人平均月收入在 1 000 元左右^②，阻碍了本土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滞后于居民需求，导致消费者的中高端需求外溢，一度引发了境外需求狂热的现象。为此，学界广泛讨论了消费升级的实现条件，并将其归纳为“需求侧”和“供给侧”两

作者：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sunjw@ruc.edu.cn；李承璋（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leechuang@ruc.edu.cn。

^①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② 《李克强总理出席记者会并答中外记者问（实录全文）》，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0-05/28/content_5515697.htm。

类。“需求侧”文献认为,收入提高是推动居民实现消费升级的根本途径^①,居民消费意愿旺盛与消费资金匮乏的矛盾是阻碍消费升级的重要原因。“供给侧”文献则认为,产品创新是拉动居民扩大中高端消费的必然要求^②,国内长期存在的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制约了消费进一步升级。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相结合的发展理念,这为我们研究消费升级提供了基本方向。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确供给侧和需求侧对消费升级的具体作用及其机制,对于构建消费作为主引擎的增长模式和畅通双循环发展格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已有研究普遍以消费结构代表消费升级,而忽略了消费规模的提高和同类目消费中的质量提升,因此本文在质和量的层面上定义了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消费升级的内涵;其次,本文结合需求侧的居民收入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并引入调节作用,分析了供需两侧对消费升级的不同影响,为更准确地理解党中央供需同时发力的决策提供经验支撑;最后,本文分收入人群、地区对消费升级路径进行考察,为分类指导消费升级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经典消费理论多从需求侧探究居民消费行为。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都明确收入提升是消费实现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将瞬间收入、非预期支出、居民消费习惯纳入分析,产生了生命周期理论、预防型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等,进一步阐明了居民收入对消费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与中国居民收入提升相伴的消费升级过程就是需求侧理论的最好佐证。^③然而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并未如过去般明显扩大消费规模和促进消费升级,特别地,富裕阶层的消费也并未随着收入同步扩张。^④这提示研究者们不能把视角局限于需求侧的消费主体,而要同时关注位于供给侧的消费客体。技术进步作为优化消费客体的重要因素,是立足供给侧分析消费的切入点。Zweimuller在分析收入差距、创新程度与消费需求的互动关系时指出,当收入维持在一定水平时,技术进步将刺激消费增长。^⑤孙早和许薛璐通过将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的自主创新效应和技术吸收效应引入多部门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发现供给侧改革带来的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可以实现消费结构的高级化。^⑥综上,需求侧的收入提高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有益于消费升级。

探究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作用机制,首先要厘清消费升级的内涵。根据上述文献,消费升级包含数量和质量两个层面,本文据此将消费升级定义在规模、内容和结构三个维度上,三者层层递进,反映出不同层次消费升级状况。在数量层面,消费升级表现为消费规模扩大,是消费者依据偏好、预算约束与市场信息调整消费决策,产生新增消费的结果。在质量层面,消费升级表现为消费结构

① 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2);S.Young.“Comparison i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Households by a Level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Korean Journal of Human Ecology*, 2016, 25(1): 39-54.

② 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7);徐朝阳、张斌:《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内需扩展:基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1)。

③ 唐琦等:《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1995—2013》,载《经济研究》,2018(2);石明明等:《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载《中国工业经济》,2019(7)。

④ 刘哲希、陈彦斌:《消费疲软之谜与扩大消费之策》,载《财经问题研究》,2018(11);张翼:《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载《社会学研究》,2016(4)。

⑤ J. Zweimuller. “Inequality,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 Springer*, 2000, 27(1): 1-20.

⑥ 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8(7)。

提升和消费内容优化。消费结构指不同类型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①，被广泛使用的恩格尔系数就是消费结构的简化表达，消费结构提升具体表现为消费者逐渐减少仅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消费比例，增加满足发展和享乐需要的精神文化消费。消费内容优化特指消费者在同一消费类型的产品选择中更倾向于中高档产品，表现为非基本消费的提升。由于消费品品牌化和专业化导致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越来越多的共同存在于同一消费类型中^②，消费结构无法捕捉消费者在同类型消费中的质量差异，而消费内容则涵盖了这一点。

本文认为，需求侧的收入提高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会分别影响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机制如图1所示。从需求侧来看，收入对消费升级存在“收入效应”和“结构自主变迁”两方面影响。第一，收入提高能够促进居民消费规模增加。随着收入提高，预算约束放宽，居民的消费行为得到释放，居民为了获取更多效用会新增消费支出，这种直接变化可以称为“收入效应”。第二，收入提高促使居民消费结构自主变迁。“结构自主变迁”指收入提高带来的预算约束改善会自动实现消费结构的改变。为满足生存需要，消费者会根据当前的预算约束形成一个生存型为主的消费结构，当收入增长时，这种消费结构就会根据预算约束的改善向更优化的状态调整，表现出收入带来消费结构变迁的态势。从供给侧来看，技术进步对消费升级存在“创新效应”和“结构被动变迁”两方面影响。第一，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居民消费内容的优化。随着技术变革，新的技术被不断投入到生产、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产品开始涌现，在市场内逐步替代低端劣质的产品。产品市场的变化让居民有了更优的消费选择，对优化消费内容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即“创新效应”。第二，技术进步促使居民消费结构被动变迁。随着技术水平的发展，居民将产生新的需要^③，与“结构自主变迁”不同，“结构被动变迁”代表居民为适应现阶段经济社会的生产生活范式，消费结构被动变化的过程，而不同阶段的生产生活范式是由当前技术水平决定的。

收入和技术对消费升级的作用不是孤立的，两者之间存在调节效应。第一，技术进步可以增强“收入效应”。随着收入提高，基本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居民需求转向非基本消费。但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非基本消费品相对匮乏，因此“收入效应”对消费规模的影响是边际递减的，只有提高技术水平、改善供给结构，才能满足新增的居民非基本消费需要、促进消费规模增长。由于基本消费品饱和的情况多发生于中高收入人群^④，所以这种调节效应在中高收入人群中更明显。第二，收入提高可以增强“创新效应”。追求优质产品是每个消费者的天性，技术水平的提高带来了更优质的产品，而这些产品由于凝结了更高的技术成本，往往包含更高的附加值，在消费品市场中并不具备价格优势。^⑤当收入水平得不到提高时，预算约束的存在使得仅有小部分消费者能消费这些产品。若此时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就会使居民摆脱陷于基本消费的困境，弥合其消费需要与支付能力的分裂，转向购买新产品，从而进一步优化消费内容。由于预算约束主要限制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所以这种调节效应对于中低收入人群更有效。第三，收入和技术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之间也存在调节效应。一方面，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变居民的理想消费结构，使得收入带来的结构变迁更适应当下产品结构，从而增强“结构自主变迁”效应。另一方面，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将优化在给定技术水平下的消费结构，使得居民的消费结构更加趋于技术进步后的状态，从而增强“结构被动变迁”效应。

① 厉以宁：《消费经济学》，1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尹世杰：《消费经济学》，7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② 刘向东、米壮：《中国居民消费处于升级状态吗——基于CGSS2010、CGSS2017数据的研究》，载《经济学家》，2020（1）。

③ 谢富胜：《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载《教学与研究》，2018（9）。

④ 陈昆亭、周炎：《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经济增长》，载《管理世界》，2020（4）。

⑤ V. Nogami, et al. “Innovation in Low-income Market: A Study Based on the Symbolic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BASE-Revista de Administração e Contabilidade da Unisinos*, 2015, 12（4）: 331-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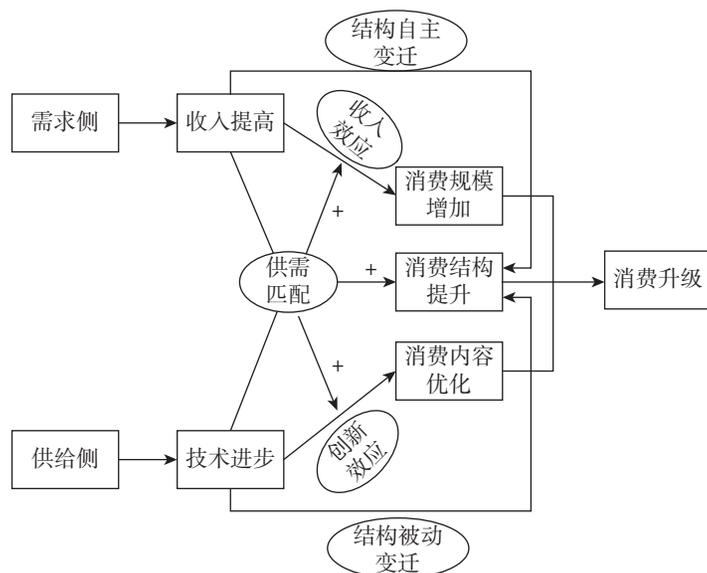


图1 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消费升级的机制

如图2所示，收入和技术的调节效应表明，消费升级是一个需求侧和供给侧相互匹配、不断向上发展的动态过程。每一个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的组合都定义了一类消费行为，在这类消费行为下，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表现出特定的特征。当居民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能力恰好符合当前技术水平下的供给结构时，消费行为达到理想状态。消费行为沿着理想状态上升的轨迹就是消费升级的最优路径（图2的灰色区域）。而若供需两侧中的一侧明显滞后，那么居民的消费行为就会为适应失衡的供需水平而滑入扭曲、低效的消费升级状态，要么是不得不将消费资金继续投入已经接近饱和的消费品，要么是勉强将必需资金抽出小部分，体验式地消费新产品。这种非良性的消费升级情况并不能长期存在，因为收入无法在技术水平停滞的情况下无限增长，技术进步也不能脱离收入孤立地实现。供需中一侧的滞后将影响较快增长的那一侧，使之放缓直到另一侧赶上并最终使得消费行为重返理想状态，这个过程可能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并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消费升级的最佳途径是供需两侧共同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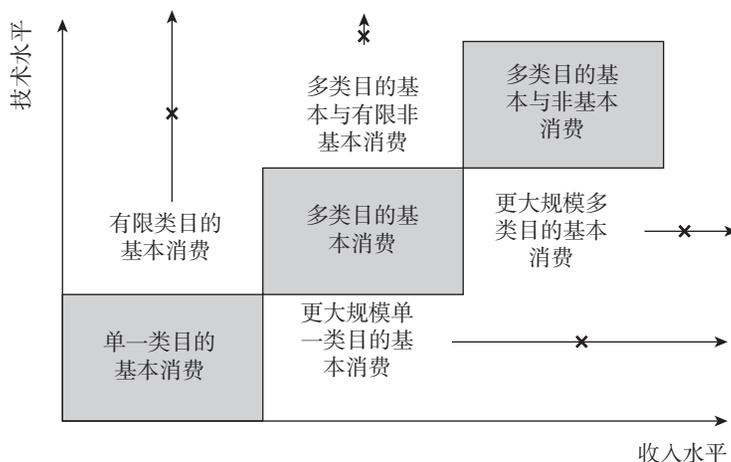


图2 消费升级路径概念图

三、消费升级的路径选择

从供需两侧共同发力实现消费升级，需要有准确的路径。我们把消费升级用三个维度来进行解释：（1）消费规模（*Scale*），用居民平均消费支出衡量。（2）消费内容（*Cont*），用居民非基本消费占比来衡量。为了区分同类消费品中一般性的基本消费和中高端的非基本消费，本文依照刘向东和米壮的思路^①，采取拓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将总消费支出分为基本消费和非基本消费^②，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相关数据计算出各年各省份居民消费支出中的非基本消费占比。（3）消费结构（*Struc*），用居民发展享乐型消费占比衡量。考虑到以往研究对于消费结构指标选取的共性^③，为便于讨论，用居民消费中除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之外的居民各类消费加总后除以居民总消费来代表消费结构。

为刻画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本文结合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统计资料，使用 2011—2018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以下简称省份）的面板数据。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 2012、2014、2016 和 2018 年的 CFPS 数据，用于计算消费内容，宏观统计资料包括 2011—2017 年的统计数据，来自 EPS 数据平台和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用于计算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为了克服极端数据的影响，我们对微观数据进行了 2.5% 和 97.5% 的缩尾处理。各年各省份消费规模和根据上述方法计算出的消费内容、消费结构加权平均到全国层面的基本情况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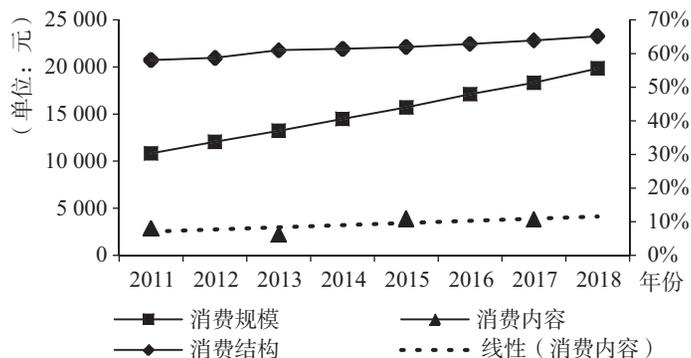


图3 2011—2018年我国居民消费情况

（一）其他变量与计量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上述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关键解释变量包括：反映需求侧的居民收入和反映供给侧的科技投入强度。居民收入是最主要的消费资金来源，最直接地将需求侧与消费升级联系起来。科研投入强度的定义为研发（R&D）经费总量与GDP的比值，以该指标反映供给侧因素具有三个优势：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除了在短期缓解产能过剩之外，最主要的内涵在于长期中“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④，所以利用科研投入强度作为解释变量更加契合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意，更能反映供给侧与消费升级的联系；第二，创新是提高消费品质量的必要途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展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反映创新驱动的

① 刘向东、米壮：《中国居民消费处于升级状态吗——基于CGSS2010、CGSS2017数据的研究》，载《经济学家》，2020（1）。

② C. Lluich. “The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73, 4（1）：21-32.

③ 罗能生、张梦迪：《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和环境效率》，载《人口研究》，2017（3）；杨凡等：《中国老年人消费结构及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载《人口研究》，2020（5）。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1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第一个指标就是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第三，该指标是比值的概念，由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相对量更能够体现区域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对于科研的重视程度。

具体而言，(1) 宏观层面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MaInc*)，在针对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的回归中，使用省级层面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2) 微观数据计算出的居民可支配收入 (*MiInc*)，在针对消费内容的回归中，为匹配使用回归计算出的消费内容数据，使用微观层面计算出的省级层面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表示；(3) 技术进步 (*RD*)，使用各省份科研投入强度来表示。

参考已有研究^①，可能影响消费升级的各项控制变量包括：(1)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Inv*)，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与人口数量的比值；(2) 价格水平 (*P*)，全国层面的价格水平；(3) 失业率 (*Unemp*)，各省份的失业率；(4) 产业结构 (*Indus*)，各省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5) 总抚养比 (*Raise*)，包括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人口抚养比；(6) 人均教育支出 (*Edu*)，各省份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教育支出与人口数量的比值；(7) 人均医疗支出 (*Med*)，各省份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医疗支出与人口的比值。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Scale</i>	217	11 858.81	6 904.30	2 844.23	43 351.30
<i>Cont</i>	124	0.14	0.10	-0.04	0.41
<i>Struc</i>	217	0.57	0.06	0.41	0.74
<i>MaInc</i>	217	17 141.22	10 042.23	3 809.74	63 552.19
<i>MiInc</i>	124	17 553.89	10 134.22	6 088.26	60 000.00
<i>RD</i>	217	1.28	1.05	0.14	6.17
<i>Inv</i>	217	3.71	1.38	1.22	8.18
<i>P</i>	217	601.49	34.63	536.10	650.90
<i>Unemp</i>	217	3.31	0.65	1.20	4.50
<i>Indus</i>	217	44.91	8.48	18.63	59.00
<i>Raise</i>	217	35.90	6.64	17.36	52.37
<i>Med</i>	217	850.88	361.24	373.93	2 783.38
<i>Edu</i>	217	1 914.39	814.24	819.97	6 741.84

为了检验需求侧的收入提高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对居民消费升级三个维度的影响，特别是为了捕捉理论部分所显示的两者的互相作用的关系，我们将两个关键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引入方程中。所有非比例的变量都取对数形式，关键解释变量技术进步滞后 1 期。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最终计量方程设定如式 (1)：

$$C_{UPG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Inc_{it} + \alpha_2 RD_{it-1} + \alpha_3 \ln Inc_{it} \times RD_{it-1} + \alpha_4 X_{it} + \lambd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C_{UPG} 代表消费升级的三个维度，关键解释变量 Inc 代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RD 代表科研投入强度， X 为控制变量， μ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λ_i 为地区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展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列 (1)、(2) 的被解释变量为消费规模。列 (1) 结果显示，居民收入增长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会带来消费总量的增加，证实了“收入效应”的存在。技术进步也在 1% 的水平下促进了消费总量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产品会激发新的非基本消费需求，从而增加总体消费规模。列 (2) 中，收入与技术进步交互项的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

^① 吕冰洋、毛捷：《高投资、低消费的财政基础》，载《经济研究》，2014 (5)；方福前、孙文凯：《政府支出结构、居民消费与社会总消费——基于中国 2007—2012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载《经济学家》，2014 (10)。

为正，说明收入增长和技术进步对于消费总量的促进作用是相得益彰的。列（3）、（4）的被解释变量是非基本消费占比，代表居民消费内容优化情况。在列（3）中，我们发现技术进步对于非基本消费占比有促进作用，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证实了“创新效应”的存在。在列（4）中，收入与技术进步交互项的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收入提高增强了技术进步的“创新效应”。列（5）、（6）的被解释变量是发展享乐型消费占比，代表居民消费结构提升的情况。在列（5）中，我们发现，技术进步会提升发展享乐型消费占比，但并不显著，说明“结构被动变迁”效应在现阶段居次要地位。收入增长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结构主动变迁”在现阶段占主导地位。由于消费结构是占比的概念，反过来看，收入增长其实提高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这或是源于我国在其他领域的高端产品相对供给不足，而食品衣着类的高端产品由于技术门槛较低，在高端市场上具有一席之地，因此当收入提升时，居民在消费结构上表现为更加偏好生存型消费。而列（6）中，收入与技术进步交互项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技术的提升会使得收入对于生存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多地转移到发展享乐型消费上。

简而言之，就消费升级的三个层面而言，收入的提高能带来消费规模的增加，但无法提升消费结构和消费内容，说明收入难以直接让消费在质量层面上升级，而技术进步可以促进消费总量的增加，也可以直接改善消费内容，不过其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不明显，反映出并未产生突破性的技术进步集中吸引居民某一类消费，而是较为平均地优化各类消费内容。当收入和技术同时作用时，两者任何一方的提高都将使得对方变得更有利于消费升级——不论是消费规模、消费结构还是消费内容。

表2 基准回归和加入交互项回归的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i>Scale</i>	(2) <i>Scale</i>	(3) <i>Cont</i>	(4) <i>Cont</i>	(5) <i>Struc</i>	(6) <i>Struc</i>
$\ln MaInc$	0.499*** (0.016)	0.116** (0.053)	—	—	-0.001*** (0.001)	-0.006** (0.003)
$\ln MiInc$	—	—	0.001 (0.010)	-0.027 (0.018)	—	—
RD	0.828*** (0.194)	0.907*** (0.270)	0.060* (0.034)	0.017 (0.041)	0.008 (0.007)	0.024 (0.021)
$RD \times \ln MaInc$	—	0.036*** (0.006)	—	—	—	0.001* (0.0004)
$RD \times \ln MiInc$	—	—	—	0.010* (0.006)	—	—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省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7	217	124	124	217	217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

此外，本文选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SDM）控制可能的空间溢出关系，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回归结果稳定可靠。

四、进一步分析

对于不同收入群体而言，供需两侧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这也是我国同时面临着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以及低收入群体大规模存在、中高收入群体境外消费旺盛的矛盾局面的原因。^①为探究该原因，本文做进一步分析。

^① 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15（1）；胡鞍钢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金晓彤、黄蕊：《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的互动机制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要素配置分析》，载《经济学家》，2017（2）。

(一) 不同收入人群的消费升级路径差异

为进一步展示和验证居民收入与技术进步在不同群体中的效应，我们按照收入水平将样本平均分成高、中、低三组，并将收入组虚拟变量 (*Group*) 与两个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引入基准回归，如式 (2)：

$$C_{UPG_{it}} = \beta_0 + \beta_1 \ln Inc_{it} + \beta_2 RD_{it-1} + \beta_3 Group + \beta_4 \ln Inc_{it} \times Group + \beta_5 RD_{it-1} \times Group + \beta_6 X_{it} + \lambd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低收入组为对照组、*Group1* 为中等收入组、*Group2* 为高收入组，列 (1)~(3) 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为消费规模、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结果显示，收入提高和技术进步的系数在各列中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而从交互项来看，列 (1) 的结果说明，相比低收入组，在收入越高的组别中，收入提高对于消费规模的促进效应越小，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则越大。这说明，对于高收入的居民来说，进一步提高收入无助于他们扩大消费支出，因为主要是消费对象的种类和品质限制了他们的消费行为，这也解释了为何作用于产品市场的技术进步在高收入组中的效果会更加明显。列 (2) 中，就技术进步而言，相较于低收入群体，技术进步对于高收入居民的消费内容优化是更加有益的，但对于中等收入居民则并没有额外的增强作用，这可能缘于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人群的重点消费领域，表明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中高端消费规模仍是未来需要攻克的一大难题。反观收入的作用，对于收入更低的群体而言，收入提高优化消费内容的能力更强。列 (3) 中，就技术进步而言，居民的收入越高，技术进步越会使他们将生存型消费转换为非生存型消费，展现出产品市场对于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而就收入而言，越是在中高收入组中，收入增加越有机会提升消费结构，部分反映出由于低收入者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较大，在预防性储蓄的压力下不愿意将消费资金投入一些大宗支出。^① 同时，我们也发现中等收入组与高收入组的系数比较接近，因为两类人群的消费差异可能主要体现在同类商品的质量上，也侧面说明我国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愈发趋于成熟并走向稳定。

表 3 收入人群分组交互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i>Scale</i>	(2) <i>Cont</i>	(3) <i>Struc</i>
$\ln MaInc$	0.747*** (0.068)	—	-0.046*** (0.005)
$\ln MiInc$	—	0.168* (0.098)	—
<i>RD</i>	0.989 (0.690)	0.017 (0.036)	-0.051 (0.049)
$Group1 \times \ln MaInc$	-0.177** (0.076)	—	0.048*** (0.004)
$Group2 \times \ln MaInc$	-0.183** (0.074)	—	0.046* (0.027)
$Group1 \times \ln MiInc$	—	-0.125 (0.078)	—
$Group2 \times \ln MiInc$	—	-0.162* (0.092)	—
$Group1 \times RD$	0.041 (0.102)	-0.004 (0.007)	0.054*** (0.012)
$Group2 \times RD$	0.322* (0.181)	0.060*** (0.021)	0.063*** (0.015)

① 殷兴山等：《制度变迁、不确定性、收入增长与居民储蓄率——基于宁波案例的因子分析》，载《金融研究》，2007（9）。

续前表

被解释变量	(1) <i>Scale</i>	(2) <i>Cont</i>	(3) <i>Struc</i>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7	124	217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性标准误。

以上回归结果反映出需求侧和供给侧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情况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中高收入群体迫切需要供给侧的技术进步来实现消费升级，而需求侧的收入提升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更有效。

（二）区域消费升级的路径分析

资源分布不均衡、要素流动受限等问题的存在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也表现在居民的消费领域。^①要改善这种区域消费不均衡的情况，需将供需结合分析的空间尺度具体到区域层面，以明确各区域实现消费升级的路径。为此，我们分2006—2010年、2010—2015年和2015—2018年三个阶段，画出了各省份居民收入水平和科研投入强度的分布，并标出了平均水平，参见图4。

分象限来看，在第一象限的区域中，居民收入水平和科研投入强度较高，居民消费需求和产品市场在较高水平上达成均衡。这些区域在第一阶段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江苏五个省市，同时，广东省和山东省在第二阶段也可能加入。这些省份都是位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强省，是引领我国消费升级的重镇，这些区域应把握初步成型的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关系，加速形成消费的新模式新业态，并以此带动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

第三象限囊括了陕西省^②、辽宁省之外的我国所有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省份，以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河北省和海南省。这说明不平衡不充分仍是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仍有广大居民面临着消费资金不足和产品供给不好的两难情境，这些区域是未来推进消费升级的主战场，对这些地区而言，需求和供给两侧的努力缺一不可。根据区域的象限分布不难发现，第三象限区域的消费升级路径大概率是通过提振收入先步入第四象限，如内蒙古自治区和重庆市已十分接近，但也有区域可能通过供给侧的努力跃迁至第二象限，如安徽省和湖北省。伴随这些区域整体实现消费升级，我国也必然转型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新模式。

位于第四象限的广东、山东、福建、辽宁四省，基本特点是拥有较全国平均水平高的居民收入，但是科研投入偏低，这表明消费资金已不是居民消费的主要限制，当地供给结构性落后于居民的消费需要才是根本原因，因此这些区域应在稳收入的同时，更侧重供给侧的改革，从而实现从第四象限向第一象限的跃迁，这种消费升级路径已经被广东和山东两省所证实。结合第三象限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先侧重需求侧提振居民收入，再通过供给侧改善产品市场是一条比较成熟、有迹可循的消费升级路径。而先强调供给侧技术引领，后侧重需求侧收入提升的消费升级路径尽管成功的经验不多，但随着创新体制机制的不断革新完善，创新将逐步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能，在未来这或许反而是消费升级的一条快速通道。

^① 张翼、林晓珊：《消费不平等：资源支配逻辑和机会结构重塑》，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4）。

^② 虽然陕西省最初位于第二象限，但已逐渐逼近第三象限。陕西省是在第一阶段全国仅有的科研投入较高而居民收入较低的地区，因此更需强调需求侧的居民收入提升，才能充分发挥供给侧已有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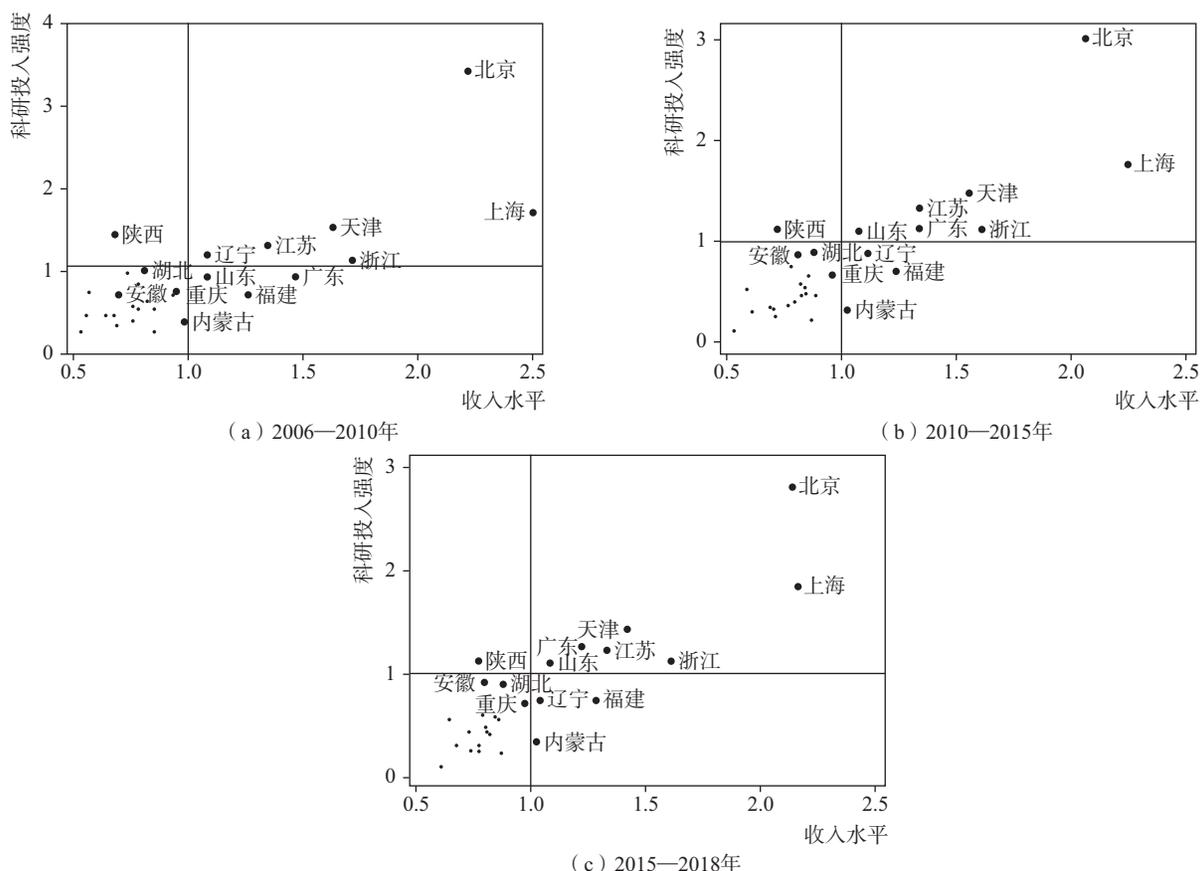


图4 2006—2010年、2010—2015年和2015—2018年居民收入水平和科研投入强度区域分布

注：横（纵）坐标轴为当年该省份居民收入（科研投入强度）与当年全国均值的比值，其中第三象限省份为31省份除一二四象限中省份外的所有其他省份；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和CEIC数据库。

五、结论和建议

为探究消费升级的实现路径，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消费升级定义为消费规模增加、消费内容优化和消费结构提升三个维度，并将需求侧的收入提高和供给侧的技术进步纳入消费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讨论了两对消费升级的不同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第一，需求侧的居民收入提高可以带来消费规模的增长，但并不能直接优化消费内容，而且使得消费结构更侧重于生存型消费；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带来消费规模增长，还能提升非基本消费占比进而优化消费内容，但并不能明显地提升消费结构。第二，无论从消费升级哪个维度来看，收入提高和技术进步都会使对方更有利于消费升级，存在明显的调节效应。第三，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提升收入更能促进消费升级，而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来说，技术进步则更加有效。第四，对于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先关注需求侧的居民收入提升再侧重于供给侧的技术进步是一条比较成熟可行的消费升级路径。

本文的结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国国内经济循环的主要堵点之一就是消费升级，消费升级不畅一方面导致居民维持着对标准化产品的需求，限制了市场运行模式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①，使面临的“低端锁定”和“高端封锁”情况再度恶化；另一方面阻碍了本土高端产业的利润实现，导致劳动工资上升乏力、购买力疲软，进一步加剧了供求脱

① 张杰、金岳：《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演进、战略价值与改革突破口》，载《改革》，2020（9）。

节。因此，只有实现消费升级，才能真正畅通国内大循环、更好地促进“双循环”。

基于研究结论和上述基本判断，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第一，实现消费升级必须从供需两侧共同发力。尽管现阶段深化供给侧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线，但这并不代表需求侧的努力就失去了重要性。只有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才能最大限度地从数量和质量上推进消费升级，并最终达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第二，应围绕收入分层指导消费升级。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我国居民面临的消费问题并不相同，实施差异化的消费升级指导政策势在必行。制约中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主要问题是国内市场上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需要推进技术革命突破核心技术封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产品，引导高端需求回流。而对于收入偏低的居民来说，由于缺乏基本的消费资金，供给侧改革提供的更多优质选择并没有改变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分配机制，提升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的精准度。第三，各区域需选择合适的消费升级路径。我国各区域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技术水平决定了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消费升级路径，核心要点是补齐短板，不让供需中较弱的一侧成为消费升级的掣肘，同时在政府指导下加速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打破商品流通阻碍，利用空间上不同的需求结构消化不同层次的产品。

A Study on the Path of Upgrading Consumption Combining both Demand and Supply Sides

SUN Jiuwen, LI Chengzha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nimpeded domestic circulation, upgrading consumption plays a vital role i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This article defines three dimensions of consumption upgrading based on available literature, that is, the dimensions of increasing consumption scale, optimizing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improving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demand-side income increase and supply-sid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Based on micro and macro statistical data,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1)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income can increase consumption scale, but it does not optimize consumption content or improve consumption structu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increase consumption scale and optimize consumption content, but cannot exert much effect 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2) the improvement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ll make each other more conducive to consumption upgrading; (3) the increase of income is more effective for lower-income groups to achieve consumption upgrading, while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more effective for higher-income group to this end; and (4) for the vast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is a better approach to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first and then to focus 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o achieve consumption upgrad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should be promoted from both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be guided by income stratification, and be approached wisely.

Key words: Consumption upgrading; Income level; Technical progress

(责任编辑 王伯英)